

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的发展,不仅是公有制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民营资本与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需要。

论养老机构的混合所有制与多元化产权分离制度安排

■ 郭正模 马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当前我国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方面,其目的是一是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加强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之间的合理竞争与决策制衡。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和股权之间的制衡机制、主动积极地消除由长期垄断经营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低效率、决策行政化等问题;二是增强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控制能力。通过将国有资本投入到具有“杠杆效应”的行业中,以小部分国有资产的投入来带动大量民营资本的投入,起到“以一带十”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石油、铁路等由国有资本垄断经营的行业已经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吸收民间资本发展壮大企业;同时也允许民间资本在企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分得一杯羹,实现让利于民与藏富于民。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的发展,不仅是公有制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民营资本与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需要。

目前,学术界许多人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解为是一种股份制的经济形态,强调不同所有制的产权的混合及制衡关系。但是,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产权束”或“产权簇”的结构角度上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应当是一种多元化产权的分离制度安排。其既包括产权束中的多元化所有权的“横向”结构,也包括产权束中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决策权、收益权、分配权等“纵向”产权的结构。因为股份本身既可能是多种使用使用权的产权结构,也往往是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相分离的一种经济制度。产权经济学认为,如果多种性质的所有权相互制衡下的经营管理的运作模式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则该经营模式就有利于提高经营的效率。反之,如果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人们就会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选择单一的所有权的产权模式。

产权的本质是收益与福利的预期。产权制度的建立在于明晰与稳定利益主体的收益与福利预期,以提高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效率。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不仅有害于效率,也有损于公平。产权是由众多不同的可分离的权利构成的集合,在产权束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决策权、分配权、收益权等往往处于分离状况。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除了小微企业和家庭的产权的分离性不高外,其他的企业产权分离状态应当是产权制度的常态,而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配权等统一为一个主体的形态却往往是非常态。产权分离状态下的经营活动在多数情况下有助于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所有权的经济资源的结合和参与有关的经济活动。例



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措施就是使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分离,使家庭在取得了长期性的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基础上,行使对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再通过融合家庭的私有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产权要素,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运作和农产品等社会财富的创造。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品与服务性质出发,与私人部门的私人产品不同,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部门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性质。其中一部分单位的经济活动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不经过市场交易而直接为城乡大居民或社会救助人群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以政府公共事业的非市场的运作形式为公众提供公益性质的服务,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部门、单位和企业及其活动一般以非盈利性生产、特殊经营活动和行政分配的方式,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下运转。有关事业单位的运作资金基本由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提供。由于传统的社会公益事业供给的产品与服务的覆盖面有限,类型单一,所以对于一些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领域,纯公共财政投入的运作模式不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特征,难以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多重需求。带有一定社会公益性的行业与单位的产出的经济效益往往偏低。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资本缺乏进入社会公益性行业的动力与参与积极性,需要在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所突破,以解决社会公益性产品与服务供给市场化的一系列瓶颈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多元产权分离制度,对于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产业和部门,参与准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活动,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经济增长有利的“人口红利”因素正在快速消退。政府在提供社会公益产品与服务的

工作中,完全可以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残值的同时,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来获取新一轮的“改革红利”。其中养老机构等老龄产业在长期性方面的潜力要求巨大。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严峻挑战。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老龄化人口陷阱,政府提出大力发展老龄产业的战略决策。对此,积极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或多元化产权分离制度的老龄产业被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老龄产业是一个以“夕阳”人群为服务对象的“朝阳”产业,由于需求的激增而已经步入快速成长的时期。老龄产业是以老年人为供给对象,以养老服务为主要内容,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配置养老资源,以市场交易方式向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由老年人口的需求为导向与拉动的综合性产业。然而相较于信息产业等其他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的经济再生产能力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和状态,因此被称之为“弱质产业”,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老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收慢和盈利水平偏低等方面。同时,由于老龄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为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其社会公益性质也较为明显。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之一,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老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供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支持和弱质产业政策方面的扶持。老龄产业的社会公益性特征,也为在老龄产业,尤其是老龄护理服务业中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实现多元化产权分离制度提供了政策基础。

从养老机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以养老院、养老公寓等为代表的老龄护理服务业是实现老龄人口机构养老模式的重要产业形式。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取政府举办的老龄护理服务事业的模式,由政府的民政部门直接承担养老院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及供给。但是随着城乡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由政府兴办的养老院入住

容量和服务类型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按照原有模式扩大有关机构的入住规模又必然会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加重财政负担,也无法经济、有效地为多种类型的老人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对此,根本性的出路之一在于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将民营资本引入到社会公益性老龄事业中来,建立混合所有制性质的老龄产业,实行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的有机结合。具体措施是将纯粹公有制的福利院、养老院转变为公私共有,混合经营的模式。引入民营资本后扩大服务规模和经营范围。收益按照股份进行合理分配。也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建立新的养老院或养老公寓,再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民间资本后组建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财政投入的负担,提高了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相应扩大了老龄服务机构的相关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供给,可以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较为有效地满足广大非社会救助老人的多类型的需求。在当前养老机构发展的实践中发现,但规范化、标准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用地、设施等投资。其前期投入成本高昂,尤其是土地成本、建设成本等,成为目前老龄产业发展的“瓶颈”,民间资本难以解决土地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例如政府通过国有土地的划拨方式,以开发成本价入股参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营。通过与私人资本、集体资本等共同建立股份制的老龄服务企业,从而降低了民营资本的进入成本,加快养老机构建设进度和供给规模。在有关养老机构进入营业阶段后,政府投入的股份收入可以用于对有关养老机构的床位补贴和护理人员的工资社保补贴开支,以体现有关养老机构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果经营取得正常的盈利,国有股份也可以考虑退出,使有关机构转变为民营企业性质。

从多元化产权分离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老龄护理服务业除了采取不同产权共同投资的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外,还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建设养老院、养老服务中心和养老公寓等机构,通过招标等方式转给私人机构进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与委托经营,即实行“公建民营”的发展模式。这里,养老机构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实现分离,从而引导民营机构的私人资产与国有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有机结合。国有资本通过前期基础性的、非持续性的投入即可创造长期的供给,有利于解决老龄化社会养老的供需矛盾;同时,养老机构所有权的国有资本性质有利于提高养老机构的公信力,从而避免了一部分因信任问题产生的床位“闲置”现象,提高养老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通过将国有资产性质的养老机构整体租赁或承包经营,还可以避免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市场性经营活动,对减少政府的公共服务人员编制的扩大和增加公共事务成本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进入越南的知名日本企业包括房地产开发商 Haseko, 该公司将投资 1700 万美元在河内建设一栋出租公寓楼。去年,日本及亚洲最大零售商永旺(Aeon)在越南开设了第一家购物中心,并购入越南两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股权。

在越南引领投资趋势的韩国企业是三星。这家电子集团利用税收和监管激励优势开办了两家手机组装厂,并开始建设显示屏、家电和电子配件工厂。在与中国的复杂关系中,越南不太可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双方的文化、政治和贸易关系因各种冲突(从 1979 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到去年的公海纷争)而变糟糕。但日韩的崛起是一个早期迹象,表明对外资和贸易的关注可能正影响着地区关系,如果东盟单一市场变成现实,这种关注可能会变得更为强烈。(FT 中文网)

中国制造业的两副面孔

根据汇丰银行(HSBC)和 Markit 共同编制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个月中国制造业扩张的程度比最初估计的要高。2月份该指数为 50.7,高于 50.1 的初步估算,也高于 1 月份的 49.7。该指数高于 50 表示制造业处于扩张之中。这一读数逆转了为期两个月的跌势。不过,要把该读数视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必须格外小心。汇丰银行的 PMI 指数调查对象严重偏向小型民营企业,这导致指数的波动性超过了更偏重国有企业的官方 PMI 指数。根据周末发布的数据,2 月份中国官方 PMI 指数为 49.9,显示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收缩。虽然这一读数略高于 1 月份的 49.8,却仍低于 50 的荣枯线,显示中国经济仍在恶化。那些汇丰指数调查的参与者,也提醒人们要小心看待这一指数。Markit 经济学家安娜贝尔·菲德斯(Annabel Fiddes)表示:“2 月份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运营状况总体出现了改善,各企业产出录得自去年夏天以来的最强劲增长。同时,新增业务量的增幅也提高了。”

“不过,新的出口订单再次减少,表明国外需求已经减弱。而且,生产商仍在裁员,尽管裁员的人数很少。与此同时,进货价格和出厂价格双双出现明显下跌,说明通缩压力依然存在。”(FT 中文网)

日韩商家“逐鹿”越南

一位越南变性人企业家的故事成为该国最热门的电影,并在国内引发了有关该故事是否合乎常理的辩论。但《Let Hoi Decide》引起轰动还有一个原因:这部电影是越南与韩国娱乐集团 CJ E&M 共同打造的,CJ E&M 已深入越南市场的核心。CJ E&M 在电影上大获成功是日韩对越南众多投资的一部分,这种友好与中越之间的不睦形成对比。去年,在中越爆发海上冲突后,反华暴徒洗劫了在越南的外国企业,而日韩却在悄悄运用其硬通货和软实力的影响力。

分析人士表示,这两个东亚经济领袖的举动反映出商业和战略利益的契合,会对地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越南希望限制其对中国的依赖,而日韩希望加强其对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10 国的接纳,一些人乐观地表示,今年东盟正准备启动包括逾 5 亿人的单一市场。“过去几年,越南多数新外资来自韩国和日本,”胡志明市 Fulbright Economics Teaching Program 负责人 Nguyen Xuan Thanh 表示,“这既有商业原因,也有地缘战略原因。”这一进展十分明显,从三星电子非同寻常的扩张到胡志明市打出的横幅,称赞越南与日本合作修建地标性城市铁路网络。在这个以廉价劳动力和 9000 多万消费者市场而闻名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正在构建长远利益。对于越南而言,吸引更多外资有其政治必要性,因为该国存在着坏账和国企低效等结构性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将越南的经济增速从金融危机前的每年逾 7%拉低至

2013 年的 5.4%。胡志明市公司律师弗雷德·伯克表示,对于寻求“能与之合作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日本和韩国高管而言,越南看上去“很像 20 年前的泰国”。一种表现是,2013 年越南成为日本官方开发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仅次于缅甸。根据多数为富国的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提供给越南的贷款和拨款总计 13 亿美元,其中很多用于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河内商业机场光彩熠熠的国际航站楼。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数据,2011 年至 2014 年,与之前 4 年相比,日本企业在越南的直接投资增长 3 倍多,至 90 亿美元。2013 年和去年,韩国在越南的投资总额为 26 亿美元,几乎比之前两年高出 1/3。



互联网时代的劳资斗争

■ 伯克曼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 约哈以·本科勒

他们以前被称为雇员。在服务行业的各个领域,曾经赚取稳定工资的劳动者正在绕过雇主,把自己的服务直接提供给客户。这些客户过去一直付费给企业(而非个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就是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这种工作模式体现在优步(Uber)等在线系统上。优步是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它可以把个体出租车司机和需要出行的城市居民匹配起来。这样的服务有望带来效率的极大提高;闲置资源可以被更容易地利用起来,无论这资源是空着的卧室还是未得到充分就业的人们的工作时间。但是,这里也存在风险的转移。至少在短期内,企业员工还不会受到经济兴衰变故的影响。不论是设备故障还是业务波动,大部分风险都由公司而非个人承担。但按需经济让许多这样的保障措施都消失了。当厄运降临时,劳动者只能自己承担。

亚当·斯密(Adam Smith)解释了为什么说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如果你整天都做把金属头镶到大头针尾部的工作,你会变得非常熟练。但除非有一个你能够用大头针换来钱的市场,以及其他你可以用钱换来吃穿住的市场,否则,你无法通过制作大头针致富。专业化能带来收益的基本前提,是存在一个交换体系。

这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市场本身是有局限的。在市场中进行交易需要付出高昂成本,有时交易成本可能高到超过可获取的收益。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伟大发现,他用这一发现来解释为什么人类并非我们经济系统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形式。如果经济交换完全经由市场作为媒介进行,那所有交易都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发生;而企业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企业层级结构有时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协调经济交换。

这种逻辑不会变,但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四通八达降低了把资源和需要这些资源的人连接起来的成本。当交易成本不再如此高昂,企业也就开始失去存在的理由。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构建新型人类合作形式的最早迹象,并非出现在经济领域。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大部分跨界合作工作都是通过社交互动、而非市场完成的。对等协作生产(peer production)项目——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撰写或编辑页面出一份力的免费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或由全球大量编程人员无偿协力开发的开源操作系统 Linux——第一次以工业规模创造价值,同时又打破了企业的边界。促使这些实践活动兴起的非正式性和社交动机,不需要维持一个支付系统所需的管理费用,也不需要层级管理结构。价格信号的缺失,让必须瓜分共同劳动成果带来的金钱回报的人们之间屡见不鲜的冲突也消失了。

构成按需经济的企业是类似的,但价格信号已经取代了社交动机。正如科斯可能会预言的那样,企业的边界已经被打破。可能的效率提升非常巨大。出版和软件行业工作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也相对富裕,这两个行业已经感受到了维基百科和 Linux 那样的经济影响。但按需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深入到受教育较少、物质保障储备有限的社会阶层。当然,也难就在这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带来的是一个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但那也是一个狄更斯式(Dickensian)掠夺和混乱主导的世纪。在我们庆祝企业灭亡,被一个更加灵活的、数字化的计件工作市场所取代之前,我们必须记住,公司一直扮演一个关键角色,那就是吸收与市场生产有关的风险,这种风险此前一度由劳动者自己承担,造成了许多悲惨后果。

1914 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给员工涨了一倍月薪,开创了一种新型的企业与劳动者关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劳资冲突后,现在很多大企业会吸收部分在一个市场化经济中生存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在下一个世纪,电子市场开始取代企业,成为组织经济交换的力量,那么我们将再次面对这些难题。一些互联网企业家对此似乎也心知肚明。这是明智的。按需经济预示着一种福特当年无法想象得到的经济合作形式的到来。但其新奇性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一道社会难题,而福特正是直面这道难题的先驱者。